

劫灰與蘭花：新加坡日據時期的兩部舊體詩集

林 立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引 言

公元1900年(庚子年)8月，八國聯軍以剿滅義和團之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倉皇西逃。至1901年9月，清廷與聯軍簽訂辛丑條約，答應付上鉅額賠款等條件，聯軍始從北京撤出。淪陷期間，困處危城的王鵬運(1849–1904)、朱祖謀(1857–1931)、劉福姚(1864–?)，同聚於王氏的寓宅四印齋。三人痛國運之凌夷，透過填詞抒發其「忠義憂憤之氣，纏綿悱惻之忱」。¹由此刻成的《庚子秋詞》二卷，是近世中國文人在外族統治下創作最觸目的文學作品之一。²

《庚子秋詞》面世後不到半個世紀，僑寓南洋的華裔文人，又陷入王鵬運等人的困境。1942年2月，日軍攻佔新加坡，將該地易名為昭南島(Syonon-to，昭南意為「南方之光」³)，展開了為期三年半的黑暗統治，直至1945年9月英軍光復新加坡為止。日軍對待淪陷區人民的手段，較八國聯軍更為殘酷，佔領之初，即進行肅清大檢證，以打擊華人的抗日情緒，被屠戮的華僑至少達二萬五千之眾。⁴嗣後又推行連

¹ 徐定超：〈《庚子秋詞》序〉，載王鵬運等：《庚子秋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2年)，頁2。

² 有關《庚子秋詞》的研究，參閱 Shengqing Wu (吳盛青), *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1900–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pp. 39–40, 82–104。

³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88.

⁴ 據日軍隨軍記者高瀨稱，日軍原定屠殺五萬人，實際屠殺的數字，約為五萬人的半數。1946年9月11日的《星洲日報》、《總匯報》社論則提到，根據戰時《彼南日報》(檳城)載稱，新加坡被檢證的「不良分子」為七萬餘人。日本的歷史學者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戰爭》一書，亦引1942年《朝日東亞年鑑》的記載，認為新加坡共有七萬華僑被檢證。另有其他說法，見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頁533–35。另參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教育出版私營有限公司，1994年)，頁213–15；Ralph Modder, *The Singapore Chinese Massacre: 18 February to 4 March 1942* (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4), pp. 3, 58; “Plan to Kill 50,000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Strait Times*, 19 March 1947, p. 5。

串高壓、奴化的殖民政策。新加坡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財富被榨取，精神受摧殘。這一段慘痛的經歷，見諸不少史籍、回憶錄中。亦有一些小說、散文以此為題，申訴日軍的暴行。⁵筆者則發現了三套跡近被遺忘、有關新加坡日據時期的舊體詩集：謝松山（1891–1965）的《血海》、李西浪（1898–1972）的《劫灰集》、鄭光漢（1909–1971）編的《蘭花集》。三部詩集都在戰後出版，但《劫灰集》和《蘭花集》卻是在淪陷期間寫成的。《血海》以紀事詩的形式，附以詳盡的注文，追述日佔時期暗無天日的社會狀況，以及審判日本戰犯屠城大檢證的過程，這詩集筆者擬另文探討。較之《血海》，《劫灰集》的敘事成份減少，而多了個人對於這場浩劫的感懷。《蘭花集》則是亂世的文人唱和，它以鄭思肖（1241–1318）等南宋遺民為榜樣，透過詠蘭，表達了詩人們的國族意識，對光復的冀望，以及抑塞無聊、借酒澆愁的心情。本文以《劫灰集》與《蘭花集》為對象，首先簡述淪陷之前新、馬華人的抗日活動，以此說明兩部詩集裏抗爭話語產生的背景，次則探討兩部作品與「淪陷區文學」、「遺民文學」的關係，繼而從作者的身份和文本解讀，剖析新加坡華族文人在日軍統治下的生存情境、態度與策略、遺民意識與話語的重塑，並比較敘事與抒情、群體唱和與個人表述之間的關聯。回想當年各人困守危城時境遇之淒苦，實有過於八國聯軍入京時的王鵬運、朱祖謀等。王、朱因蒿目時艱，寫就《庚子秋詞》，而鄭光漢、李西浪等的酬唱，亦可與之後先輝映。它們是近百年來海內外華族飽受列強欺凌的文學實錄，具有尚當顯著的時代意義。

淪陷以前新、馬的抗日運動和抗戰文學

英殖民地時期，新、馬華人，特別是第一代華人，仍多自視為中國僑民，因而他們對中國局勢的變化，皆甚為關注，而日本對中國的挑釁和侵略行為，更引起他們的反日情緒。楊松年即指出，二戰之前東南亞華人的中國意識還是極為強烈，這可充份表現於日本侵佔中國時，民間「高昂的戰鬥姿態上」。⁶新、馬兩地最早出現的反日運動是在1915年，當時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條約，意圖擴大在中國的霸權，時任總統的袁世凱竟答應日人的要求。消息傳至新、馬，即引發一波反日浪潮，包括抵制日貨、攻擊日本僑民、張貼反日標語等。⁷嗣後在1919年舉行的巴黎和會，日人借機吞併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導致「五四運動」爆發。新、馬的熱血青年瞬即響應，

⁵ 參考 Yeo Song Nian (楊松年) and Ng Siew Ai (黃秀愛),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s Reflected in Singapore-Malaya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5–49),” in P. Lim Pui Huen and Diana Wong,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106–19。

⁶ 楊松年：〈生命與文化：從東南亞華族移民史說到文學本土性的內涵〉，載李選樓（主編）：《新華文學50年論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15年），頁262。

⁷ 參閱崔貴強：《新加坡華人》，頁189–90。

帶頭抵制日貨，又向經營日貨的華商以及在日人公司任職的華人僱員發恐嚇信，最後在新加坡、檳城等地的活動更演變為騷亂。⁸

1928年「濟南慘案」、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進一步挑起新、馬華人對日本的憤恨。這時期的反日運動，在陳嘉庚（1874–1961）等華僑領袖及中華總商會的帶領下，更具規模，更有組織性。先是成立「山東慘禍籌賑會」，以籌募義款，賑濟慘案受害者。「九一八事變」後，新加坡華社一面致電國際聯盟，要求出面干預，一面又召集全僑大會，力斥日軍暴行，籲請國人團結一致，救國圖存。主要的華文報章如《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等都譴責日軍破壞和平。「一二八事變」同樣引起華社的極大震動，新加坡的中華總商會隨即帶頭成立「新加坡救濟祖國難民募捐會」，在物質及精神上支援國軍。兩個半月內，新、馬各地華人即籌得叻幣十九萬一千餘元，折合國幣一百零四萬二千餘元。此外又有抵制日資等活動。⁹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新、馬兩地的抗日救亡運動進入高潮，且一直持續至淪陷為止。新加坡華人先是在同年8月成立「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號召華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復於1938年10月聯合南洋各地華僑，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一致抗日。籌款而外，又購買愛國公債，以支援國民政府的財政。另有抵制日貨、拒絕為日資企業工作、醫藥援華和機工回國服務等行動。總計從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間，在東南亞華人捐款總額的二億一千七百餘元中，新、馬的款額即佔了百分之五十八。同時日貨在新、馬的進口額亦大幅下跌。¹⁰凡此皆見出新、馬華人抗日運動的成效，以及他們支援祖國抗日的決心。

除了捐款、抵制日貨等舉措外，新、馬華人知識階層如中國國內一樣，自1937年起，亦掀起一場抗戰文藝運動，產生了大量戲劇、詩歌、小說、散文作品，另外又催生了「文學通俗化運動」、「詩歌大眾化運動」，試圖以淺白的文體和語言，向華僑宣傳抗日救國。就新詩方面而言，先後有「吼社」、「澎湃社」等新詩團體出現，大部份作品都是反映當地的救亡動態和戰時生活，而不像小說及戲劇等，早期多以描寫中國題材為主。¹¹此時期報章副刊的主編，不少是由中國南來的作家擔任，他們都強調抗戰救亡，再度提高了當地華人的僑民意識。¹²例如主編《星洲日報》副刊《文藝周刊》的郁達夫（1896–1945）曾稱：「祖國抗戰已經歷兩年又六個月，以後正是我們

⁸ 同上注，頁190–91；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470–71。

⁹ 崔貴強：《新加坡華人》，頁192–94；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472–78。

¹⁰ 詳見崔貴強：《新加坡華人》，頁194–201；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478–522。

¹¹ 參閱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1986年），頁148–70、191–97。

¹² 楊松年：〈戰前新馬華文文學論略〉，載林水欒、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八打靈再也：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年），頁346–47。

加緊反攻，爭取最後勝利的階段。在這階段裏，文藝的鬥爭力之急須開展，對內宣揚的必須加緊，向漢奸失敗主義思想之急切進攻的尤其重要，自不待言。」¹³ 郁達夫復在文中強調在此重要時期，要顧及舉國一致的大團結，而且文藝與政治軍事已不可劃分。如此具有戰鬥性的文章，很能反映淪陷前新加坡文藝界的寫作氛圍。

其時新、馬的舊體詩創作，同樣呈現出強烈的反日情緒，這與中國國內在抗戰時期舊體詩再度復興的情況相似。筆者曾在另文指出，受到日本侵華的刺激，舊體詩的創作數量在中國顯著上升。在國族傾危的時刻，強烈的民族意識喚起了作家對舊體詩這種「骸骨」的重視和認同，而且其易誦易記的特質，在宣傳方面又較其他文類優勝。不僅如此，舊體詩在反映亂世、宣揚救國方面，亦有源遠流長的傳統根基。在南宋、晚明、晚清等政治轉型時期，文人即多以詩來宣揚民族主義和抵禦外侮。然則抗戰時期舊體詩的復興，乃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民族文化因素在內。¹⁴ 袁一丹則稱抗戰時期文人的舊詩癮復發，是與舊體詩的隱微性(esotericism)有關。她引用俞平伯(1900–1990)在1920年代跟周作人(1885–1967)所說的話，指出「中國舊詩詞之特色至少有三點：(1) impressive, (2) indirect, (3) inarticulate」。大致可譯為「印象式的、間接的、難以言說的」。然則「舊詩詞更善於迂回地傳達難以言明的經驗」。相對於鼓吹言無不盡的新文學，舊詩詞更有利於詩人在非常時期表達其隱密的心事。¹⁵ 不過筆者認為，這種「隱微修辭」的說法，似乎較適合應用於淪陷區的詩人，淪陷區以外的許多作品，其實並不那麼「隱微」，反而是相當高亢的。

至於新、馬華人在抗戰時期的舊體詩創作，李慶年在其《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一書中有專章論述。他指出新、馬報刊上雖然有不少舊體詩鼓吹抗日，但消閑、言情之作亦往往紛陳雜出。不過由「南僑詩宗」邱菽園(1874–1941)主編的《星中日報》副刊《遊藝場》，卻將過去的諺諧滑稽，一改而為以抗日為主題。¹⁶ 這種嚴肅、閑情作品並置的情況，頗能顯示舊體詩作者創作的習慣。在《劫灰集》、《蘭花集》中，我們同樣看到在抗爭話語之外，有若干關於飲酒、追述風流往事的作品。如此較為世俗化的題材，在新、馬新文學界提倡的現實主義寫作中，卻是無法立足的。例如1940年初在《新國民日報》副刊《新流》中倡議的「馬華文化現實化運動」，即提出要「警醒消極苦悶份子」，不要因時局不利而沮喪，要免除感傷的調子。此外又有「反對新式風花雪月」等口號在各報刊中提出，顯見新、舊文學作者有不同

¹³ 郁達夫：〈文藝及副刊的一年〉，轉引自楊松年：〈戰前新馬華文文學論略〉，頁347。

¹⁴ 見拙著〈骸骨之迷戀：論新文學家創作舊體詩的緣由〉，《東方文化》第43卷第1、2期合刊(2010年)，頁217–22。

¹⁵ 袁一丹：〈隱微修辭：北平淪陷時期文人學者的表達策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1期，頁13–14。

¹⁶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521。

的創作態勢。¹⁷要之，淪陷前的新、馬舊體詩人，沿續早年由駐新領事左秉隆(1850–1924)、黃遵憲(1848–1905)等奠下的基礎，創作活力甚為旺盛。李慶年甚至稱此時期的新、馬舊體詩是歷來最有成就的。他指出在英國殖民政府的言論限制下，馬華新文學進入低潮，舊體詩卻能「含蓄地進行著宣傳抗日的工作」，說明「舊體詩有著本身有利的因素」，能「與新文學分擔抗日的神聖任務」。¹⁸而前述舊體詩的創作特質與傳統，亦為新、馬文人在戰時及淪陷時期提供了另一種創作選擇。

《劫灰集》、《蘭花集》的作者，在新加坡淪陷前亦大多曾投身於抗日運動的波瀾之中。李西浪於1934年在馬來亞怡保創立《中華晨報》，自任社長和總編輯。報紙的創立宗旨是鼓勵華僑團結抗日，反對內戰。因其言論過於激烈，在1941年被英殖民政府勒令停刊。該報的排字職工，甚至於1938年利用工餘時間組成「工餘劇團」，上街義演。¹⁹另外《蘭花集》的其中一位作者李鐵民(1898–1956)，則是陳嘉庚的私人秘書。他「文筆雄健，學通古今」，曾協助陳氏在新加坡統籌抗日救國運動。李鐵民與《南洋商報》總主筆胡愈之(1896–1986)、《星洲日報》副刊編輯郁達夫等，同為左傾的中國民主同盟的一員。²⁰可見他在淪陷前的抗日運動中，曾擔負頗重要的責任。另外胡浪漫、傅无悶等，亦曾任《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的編輯，這些報刊在鼓吹抗日方面都不遺餘力。明乎此，則他們在淪陷時期組成志同道合的唱酬群體，一同在詩中抒發反日情緒，便是其來有自了。

李西浪等又屬於所謂的「南來作家」，具有濃厚的家國意識。雖然李氏寫過反映南洋生活的小說《蠻花慘果》，但從他創辦《中華晨報》鼓吹抗日救國一點看來，無疑他仍視中國為祖國。而《蘭花集》的編者鄭光漢，自「一二八事變」之後南來新加坡，淪陷期間名其所居為「思漢齋」，更彰顯了他的身份屬性。要之，這些南來文人在英殖民地和日本佔領區中生存，背負著複雜的華人身份認同問題，一方面他們是海外僑民，不免有一種離散或流寓天涯的心態，一方面卻心向祖國，故鄉的戰火更加深化了他們的國族認同。楊松年在分析了東南亞華人文學、宗教信仰、教育的情況後更直截地總結云：二戰之前東南亞的文學作品，或是流傳在東南亞的華族文化，包括廟宇建築，「都充滿著中國性，對那些有意要排除中國的影響，或忽視這些文學、文化作品的中國性的人來說，那是自掩眼睛說假話」。²¹有關李西浪等人的南來經歷以及在淪陷時期作品中流露的國族意識與遺民意識，將在後節再行論述。

¹⁷ 有關新、馬抗戰時期的文化現實化運動，參閱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頁167–68。

¹⁸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529。

¹⁹ 飄雁：〈怡保《中華晨報》〉，載新馬僑友會（編）：《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香港：香港見證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頁464。據《南洋商報》報導，《中華晨報》在1939年便已易手，改名為《霧華日報》，因李西浪另有高就，未暇兼顧云云。見《南洋商報》，1939年4月26日，第14版。

²⁰ 見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514。

²¹ 楊松年：〈生命與文化：從東南亞華族移民史說到文學本土性的內涵〉，頁262。

淪陷區文學與遺民文學

《劫灰集》、《蘭花集》既是在日據時期寫成，從創作處境而言，則它們似與當時中國本土其他日佔區的文學創作一樣，皆可視為「淪陷區文學」的一種。但新加坡是一個英國殖民地的淪陷區，它們不被納入中國「淪陷區文學」的研究範圍，自是可料。²²且當地日據時期的華文文學創作，至今仍未見有發掘。《劫灰集》與《蘭花集》的重新發現，可算是首例。固然，不同的淪陷區或日本殖民地，其歷史情境與寫作脈絡，文人與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寫作動機等，都難以簡單地劃一看待。但拿這些淪陷區與新加坡的情況來比較，或能進一步說明這兩部詩集的特殊性。

中國學界指稱的「淪陷區文學」，主要是指白話文創作。作品的內容相當繁富，創作目的與態度亦頗為複雜。據學者的研究，大致呈現為通俗文學、鄉土文學、女性文學等幾種「或挑戰、或疏離於殖民中心話語的『邊緣』文學形態」。²³從文體與創作傾向而言，《劫灰集》、《蘭花集》固亦有其邊緣性，但當前學界所謂的「淪陷區文學」，不少是在淪陷區公開發表的，有些甚至獲得日本官方的文學獎。²⁴而具有極強反抗意味的《劫灰集》和《蘭花集》，在文禁嚴厲的新加坡，卻只能是地下作品。以此觀之，兩部詩集在文體、產生地域和寫作態度等方面，對「淪陷區文學」這一概念都有所開拓。

至於中國淪陷區裏的舊體詩創作，是否能和《劫灰集》與《蘭花集》互為參照，亦需要從作者的出處立場著眼。如此考量，儘管是將政治凌駕於藝術之上，但無可否認的是，政治立場決定了這些作者作品的基調與出版機會。首先，日據下的北京、南京、上海有不少附日或在日偽文化機構任職的「落水」文人，如周作人、龍榆生（1902–1966）、陳寥士等，他們的作品自然不會有甚麼抗爭意味。舉例而言，周作人的詩往往「發言玄遠，隱晦支離」，雖然表面上閑適沖淡，卻蘊含著「難以言說的苦味與陰鬱之氣」。²⁵例如〈苦茶庵打油詩〉其十二：「河水陰寒酒味酸，鄉居況味不勝言。閑門偶共鄰翁話，窺見庵中黑一團。」詩寫於1941年底，「庵中」一句大抵是諷刺日偽政府，言辭間曲折地透露了他內心的憂懼之情。²⁶而在南京的龍榆生、陳寥士，分

²² 「淪陷區文學」可按淪陷時期與地區分為四個部份：（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淪陷區文學；（二）1937年「七七事變」後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淪陷區文學；（三）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上海淪陷區文學；（四）南京、武漢、香港等個別城市的淪陷區文學。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與上海「孤島時期」的文學，則不在此範疇之內。見錢理群：〈「言」與「不言」之間——《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總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1期，頁25。

²³ 見黃萬華：〈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及其研究〉，《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頁124。

²⁴ 同上注，頁128–29。

²⁵ 張應中：〈閑適與人道——論周作人的舊體詩〉，《中國韻文學刊》2009年第3期，頁84。

²⁶ 轉引自張應中：〈閑適與人道——論周作人的舊體詩〉，頁85。袁一丹則指出，周作人等的寫作，「不僅是一種文學行為，也是倫理的表達方式」。他們試圖透過隱微的言語，來為自己辯護。見袁一丹：〈隱微修辭：北平淪陷時期文人學者的表達策略〉，頁2–3。

別是舊體文學刊物《同聲月刊》和《中國詩刊》的主編。這些刊物一方面鼓吹「復興東方固有文化」，一方面又是日偽政府用以籠絡中國文人、倡導中日協作的工具。日偽軍政要人如汪精衛（1883–1944）、梁鴻志（1882–1946）等，都在這兩份刊物上發表舊體詩作。²⁷他們儘管有其「難言之隱」，但政治立場與創作方向，畢竟與《劫灰集》、《蘭花集》的作者背道而馳。

淪陷區另有一類拒絕「落水」的文人，與李西浪等堪稱同道，如在北平絕食而死的陳三立（1853–1937），以及蟄居上海的錢鍾書（1910–1998）。據解志熙的研究，錢氏有九首淪陷時期的詩作傳世，姑舉其〈漫興〉以見一斑：「詩書卷欲杜陵顛，耳語私聞捷訊傳。再復黃河收黑水，重光白日見青天。血仇也值乾坤賭，留命終看社稷全。且忍須臾安毋躁，釘灰腦髓待明年。」²⁸這首詩仿效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光復社稷的願望十分明確。由於措辭相當激烈，完全不符合袁一丹所稱的「隱微修辭」，錢氏的這些作品自然不能在淪陷區發表。²⁹是以其創作地域雖與李西浪等相去天南地北，但均是仁人志士在日軍的鐵蹄下所發出的反抗聲音，即便這種聲音是多麼的微弱。

筆者亦注意到日據時期的臺灣，舊體詩文創作相當昌盛，但臺灣詩壇卻頗有點馴化的現象，一是由於臺灣的日據時期較長，反抗意識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日人懷柔政策的施行日漸萎縮；二是日人在統治臺灣時，本著以華制華的文化政策，頗為積極地參與詩壇活動，臺灣的詩社因而出現反日與附日（或被馴化）兩種態勢。³⁰這一情況卻無法在新加坡或中國淪陷區內複製。日軍原希望以殖民地「解放者」的姿態獲得新加坡民眾的合作，但他們所實行的檢證大屠殺和高壓統治，卻使仇日的情緒更為熾烈。³¹這從《劫灰集》和《蘭花集》中的作品可見一斑。

²⁷ 經盛鴻、李國瑞：〈日偽時期南京的作家與文學創作〉，《鍾山風雨》2010年第4期，頁48–50。

²⁸ 轉引自解志熙：〈「默存」仍自有風骨——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的舊體詩考釋〉，《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頁101。

²⁹ 錢鍾書寫於淪陷時期的九首詩作，以「默存」之名發表於1942–1943年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的刊物《國力月刊》內。見解志熙：〈「默存」仍自有風骨——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的舊體詩考釋〉，頁92–93，101–2。藍田師範學院初設於湖南藍田，當時湖南尚未失陷。另外，滯留在北平淪陷區的俞平伯，其著名的舊體詩〈遙夜闌思引〉，亦以傳統的寄託手法，道出在淪陷時期的「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發表時間亦在戰後。參閱袁一丹：〈隱微修辭：北平淪陷時期文人學者的表達策略〉，頁5；袁一丹：〈俞平伯〈遙夜闌思引〉表微〉，《漢語言文學研究》2012年第3期，頁48。據後文所言，俞平伯在淪陷時雖然加入日偽組織華北作家協會，卻沒有完全「落水」，因而戰後所承受的道德壓力，較之於周作人要少得多，「基本上處於被保護的狀態」（頁48）。

³⁰ 參閱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頁53–80；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發展概述（1651–1945）〉，載《2004海峽兩岸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2004年），頁441–44。

³¹ Turnball, *History of Singapore*, p. 191.

由於交通阻閼，消息封閉，李西浪、鄭光漢等新加坡舊體詩人，實際上亦無法與其他淪陷區的作家互相呼應、互為砥礪。他們可資借鑑和自我攀比的對象，便是前代的遺民詩人，例如宋末元初的鄭思肖等。他們挪用遺民話語創作，一方面是確實有被遺棄（被英人遺棄）、遺存的感覺——身在海外的殖民地淪陷區，自視為中華子民，感覺亦如同亡國的遺民；一方面則借助遺民傳統中的隱微書寫或用典，試圖避過日本佔領者的偵緝。³²他們流寓他鄉，本已有寄人籬下之感，卻忽而在殖民地上被再殖民，精神上的雙倍失所與創痛可想而知。因而他們所創作的不僅是海外華人的離散文學，亦是離散文學中的遺民文學。這一創作上的雙重性，在現代文學中可謂絕無僅有。而像前代的遺民一樣，他們對自我的期許，便是在絕境中不改氣節；對於遙遠的祖國，則渴望有重光之日（有關李西浪等與遺民傳統的關係，下文「鬼域中的淨土」一節有更詳細的分析）。不過在新加坡，他們亦知道重光的希望，是在之前的殖民者英國身上。但經歷過日軍殘酷的統治後，英人的重來仍算是一種解脫。因此，儘管他們對英軍在守衛新加坡一役中所展現的無能予以尖刻的諷刺，但當英美盟軍節節勝利之時，他們亦不禁「眉飛色舞」。³³

郁達夫從新加坡流亡到印尼，處境和李西浪、鄭光漢等相若。他與李西浪、李鐵民等也都認識，³⁴流亡期間他寫成的〈亂離雜詩〉等多首作品，憂生念亂之感、忍死待時之情態，以至於對兒女私情之牽繫，都與李西浪的《劫灰集》不謀而合，³⁵而最終竟為日軍所害，未能與新加坡的文友共慶劫餘。³⁶

³² 袁一丹對這樣的隱微修辭有相當深入的分析，她認為用典是一種文本加密手段，「如果把用典比作信息編碼的過程，通過代碼的替換、重組，可以將機密信息轉換成未經授權或缺乏相應知識背景的訪問者難以破譯的亂碼，只有掌握了代碼庫或被授權的圈內人才能對敏感信息予以解密」（〈隱微修辭：北平淪陷時期文人學者的表達策略〉，頁12）。

³³ 李西浪：〈思漢齋五度賞蘭〉，載李西浪：《劫灰集》（香港：永發印務有限公司，1946年），頁二七下。

³⁴ 李鐵民為李西浪《劫灰集》所作序云：「友輩之詩，平昔所喜，僅郁達夫、潘國渠（潘受）寥寥二三子耳，西浪亦其一也。達夫、國渠，今方遠隔天涯，難相問訊，請就近一言西浪。」（《劫灰集》，頁三下）是李鐵民當時尚未知郁達夫已被日人殺害。郁達夫詩集中，有〈題張善子《黃山圖》，和西浪讓畫詩原韻〉二首，載浙江文藝出版社（編）：《郁達夫詩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260。

³⁵ 郁氏詩中甚至有「此身真似劫餘灰」之句。見郁達夫：〈胡邁來詩，會有所感，步韻以答〉，載《郁達夫詩全編》，頁271。郁達夫流亡期間所作的舊體詩，俱見該書頁262–72。

³⁶ 1947年8月29日，李西浪挽郁達夫詩云：「兩年惆悵總思君，桀犬狺狺未足論。鬱鬱長眠寄孤島，紛紛謠○到冤魂。詩存身後應無憾，名在生前已共尊。淒絕有墳何處覓，蘇東黑浪正狂翻。」見謝雲聲：〈郁達夫詩詞及其他〉（六），《南洋商報》，1950年1月5日，第9版。

《劫灰集》與《蘭花集》的作者群

《劫灰集》在1946年出版，作者李西浪，同時亦是《蘭花集》唱酬的主要成員。不但如此，為《劫灰集》撰寫序跋的沈逸史、李鐵民、傅无悶、胡浪漫（前民國眾議院議員徐傅霖另有序），都參與了《蘭花集》的唱酬，他們與李西浪之間亦有贈答。是以這兩部詩集，創作形式雖然有異，卻多有關聯。筆者因此將它們一併研究，以見出其中成員與作品的關係。

華文舊體詩（今或稱傳統漢詩）早在十九世紀末即隨著清廷使節與流寓文人南來而播遷，在新加坡扎根繁衍。使節的提倡、文學社團的唱和以及報章的刊載，是舊體詩在新加坡流播推廣的主要動力和途徑。³⁷從出版文化和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報章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據李慶年的統計，戰前在新、馬華文報章上發表的舊體詩數目約有五萬首，數目相當龐大，當中更以新加坡一地為主。³⁸顯然，這與報界大力推動舊體詩創作有關；而不少舊體詩人，本身就是報章的創辦人或編輯。他們因利乘便，往往在報章上發表自己及同人的詩作，來建立、擴大他們的社會及文化影響力。例如邱菽園在1897年創辦《天南新報》，任社長兼華文編輯；又在1913年承辦《振南日報》，任社長至1920年；1929年他又出任《星洲日報》編輯，主編副刊《繁星》。³⁹1924年至1926年，邱菽園與詩友結成檀社，當時他擔任《叻報》副刊《叻報俱樂部》及《南洋商報》副刊《商餘雜誌》的主編，經常在報章上發表檀社的唱和。⁴⁰《劫灰集》與《蘭花集》的作者亦多在報界工作，且基本上是南來文人，以下略作說明。

李西浪原籍廣東梅縣，1925年在新加坡與李鐵民合辦小報《消閒鐘》，任經理。後來又在馬來亞怡保創立《中華晨報》，自任社長和總編輯（見前文）。他所著的白話

³⁷ 清廷駐新加坡第一任正式領事左秉隆及其繼任者黃遵憲，提倡華文教育與文化活動厥功至偉。參閱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0年6月），頁359–97；陳育崧：〈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載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年），序頁1–9。流亡政客、文人如康有為（1858–1927）、丘逢甲（1864–1912）等，亦在南洋的華文詩史上留下足跡。見高嘉謙：〈帝國、詩和孔教的流亡：論丘逢甲與康有為的南洋詩〉，載吳盛青、高嘉謙（主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183–215；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海洋文化學刊》第4期（2008年6月），頁1–24。以邱菽園為首的文學社團則承繼大中華的文人雅集傳統，凝聚了本地文人的向心力。見姚夢桐：〈時代的印記：邱菽園《檀榭詩集》的出版及其意義〉，《華人文化研究》創刊號（2013年8月），頁135–47。

³⁸ 見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27。該書基本上以報章刊登的舊體詩為研究對象。

³⁹ 見柯木林（主編）：《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教育出版私營有限公司，1995年），頁102–3。

⁴⁰ 姚夢桐：〈時代的印記：邱菽園《檀榭詩集》的出版及其意義〉，頁137–38。

小說《蠻花慘果》，1925年在《國民雜誌》上連載，被稱為「新馬華文文學萌芽時期的作品」。晚年失明，仍寫舊體詩不輟。⁴¹1952年9月，他和傅无悶等人創辦《新報》雙日刊，任編輯。李西浪因思想激進，於1957年10月與傅无悶一起被當局遞捕，《新報》停刊。後當局以兩人人老體弱，不會引起社會動盪，判令釋放。⁴²從朋輩為《劫灰集》所寫的序文，我們知道李西浪性格爽直：

沈逸史序：「君性真摯，似太虛一碧，了無片雲，顧深嫉矯飾，酒酣耳熱，言不浹意，輒面折不稍假」。

傅无悶序：「西浪之豪情俠氣，不諳流俗，蓋儕輩之特出，……每當夜闌人靜，酒酣耳熱，輒聞西浪訶斥暴政，月旦濁世之聲，慷慨激昂，不能自己。雖在鉤羅密佈，屬垣有耳之下，西浪不顧也。」⁴³

因此他的詩頗為縱肆，而又參以蘇軾、李商隱的筆調，如沈逸史的序文云：「君子詩，自謂天馬行空，無所倚附。……七古雅近謫仙，五古規模蘇杜，今體則似以玉局〔蘇軾〕為宗，間或略擬義山〔李商隱〕。」⁴⁴

《劫灰集》收錄李西浪由壬午年（1942）四月起，至乙酉年（1945）夏止，共六十三題一百二十首的詩作，另附李鐵民、傅无悶、沈逸史等的和作十三首。⁴⁵這些作品描寫了淪陷時期，「朋輩間痛念家國，感懷身世之心情」（「家國」兩字即表明了他們的國族意識），而又多「慷慨悲歌，蒼涼沉鬱」之調。⁴⁶其中一些作品屬於在鄭光漢思漢齋的唱酬，即後來收入《蘭花集》者。李西浪身為雅集的成員，每次都有參與，且隱然被視為眾人的盟主。⁴⁷他為《蘭花集》所寫的序文亦提到：「酒酣，眾舉杯為光漢壽，皆曰不可無詩，推余首倡，余適酒後耳熱，爰即席賦七律一首。」⁴⁸李西浪被推為首倡，大抵就是因為他詩才最高、性格最豪爽之故。

發起思漢齋唱酬的鄭光漢，原籍福建永春。他是著名書畫家、漫畫家，曾任《上海漫畫》周刊的主編。「一二八事變」後，鄭南渡新加坡，主編《南洋商報》畫刊，並向上海的《時代畫報》寄稿。⁴⁹淪陷期間，他因寓所思漢齋中盆蘭七度開放，遂招集

⁴¹ 柯木林：《新華歷史人物列傳》，頁45。

⁴² 〈傅无悶李西浪獲釋放〉，《南洋商報》，1957年11月16日，第5版。

⁴³ 《劫灰集》，頁二上、四下至五上。

⁴⁴ 同上注，頁二下。

⁴⁵ 李西浪戰前的詩作在《劫灰集》中俱未收錄。李鐵民稱《劫灰集》「專收星嘉坡淪陷後，日軍肆暴時之作品，以前所作，逾此十倍，全未收也」（《劫灰集》，頁三下）。

⁴⁶ 李鐵民、傅无悶序，載《劫灰集》，頁四上、五上。

⁴⁷ 胡浪漫跋，載《劫灰集》，頁三四下至三五上。

⁴⁸ 鄭光漢（編）：《蘭花集》（新加坡：鄭光漢，1966年），頁1。

⁴⁹ 以上資料見「泉州文史資料全文數據庫・晉江」：<http://mnwhstq.cn/was40/detail?record=5011&&channelid=29719>（2016年1月27日）。



李西浪《劫灰集》封面



劉海粟所繪《師漢齋圖》

友人賞花飲酒，共同詠吟，寄託家國之思。1966年，鄭光漢將雅集所錄詩作四十五首，以《蘭花集》之名出版。詩集附有劉海粟（1896–1994）作於乙巳年（1965）中秋的《師漢齋圖》一幅（見下圖）、《墨蘭》兩幅，劉海粟弟子李家耀（1901–?）和鄭光漢的《墨蘭》各一幅。另有著名書法家潘受（1911–1999）寫於1965年的兩首題詩的墨跡。

《蘭花集》收錄鄭光漢、胡浪漫、鄭文通、李西浪、傅无悶、沈逸史、蘇秋生、李鐵民、洪一爐、謝雲聲合共十位詩人的作品。劇作家俞龍孫（1895–1991）、書畫家李家耀亦曾參與雅集，唯無詩作。這些詩人都是當時新加坡藝文界和報界首屈一指的人物。李西浪和鄭光漢前文已作介紹，沈逸史與洪一爐兩位生平不詳，其他成員的資料臚列如下：

胡浪漫（1908–1991），原名邁，又名桂浪、浪曼，福建汀州永定人。他早年受新思潮影響，嘗參加大革命，對閩西農運卓有貢獻。後應其兄桂庚之命，遠遊東南亞。歷任新加坡《星洲日報》、《總匯報》、檳城《星檳日報》總編，在報章上一直宣傳全民抗日，其詩「初則憂國憂時，每發為粗豪高亢之聲。……繼而身遭離亂，九死一生，音轉悲涼沉鬱」。⁵⁰ 日軍侵佔馬來亞時，他被拘役十天，獲釋後被迫擔任新加坡《昭南日報》編輯局長。他的〈獄中吟〉大抵是寫於被日軍囚禁期間，詩云：「人似輕煙無着處，萬憂如箭攢心頭。明知生死關家國，一死成名一室愁。」頗能見出他的氣節和對家人的擔憂。⁵¹ 一年後他才獲自由，即與家人往馬來亞彭亨州立卑（Kuala Lipis）避難。戰後，他曾任《星洲日報》編輯部主持人，後因言論激進，不容於當局，遂投筆從商，文名因而沉寂。著有《曼園詩存》，與郁達夫、李西浪、李鐵民、傅无悶等有唱酬。⁵²

鄭文通（?-1949），福建永春石鼓人。曾主編《新國民日報》副刊《綠漪》及《南洋商報》的《曼陀羅》半月刊等，又在《國民日報》、《南洋總匯報》、《星洲日報》和怡保的《建國日報》供職。1947年從怡保返回新加坡。⁵³

傅无悶（1892–1965），原名振箕，福建南安人。為同盟會員，曾參與辛亥革命。1928年底，應胡文虎之邀往新加坡參與創辦《星洲日報》，後任該報總編輯。1937年轉任《南洋商報》經理兼總編輯，宣傳抗日。日本佔領新加坡時期被迫出任《昭南日報》社長。戰後創辦《中南日報》，並與李西浪等創辦《新報》雙日刊（見前文）。⁵⁴

⁵⁰ 胡邁：〈《曼園詩存》序言〉（1987年）；羅選才：〈《曼園詩選》序〉，俱轉引自「胡浪漫之詩與文章」：<http://hulangman.com/ListofPoems.html>（2016年1月27日）。

⁵¹ 同上注，<http://hulangman.com/poem018.html>。

⁵² 黃梅雨：〈文星殞落·胡浪漫〉，《星洲日報》，1992年7月26日。轉引自「胡浪漫之詩與文章」：<http://www.hulangman.com/about.html>（2016年1月27日）。《慧園詩存》二十二題亦見錄於此網站，另見羅選才：〈《曼園詩存》序〉。

⁵³ 柯木林：《新華歷史人物列傳》，頁114–15。

⁵⁴ 同上注，頁198。

蘇秋生(1899–1976)，福建晉江安海鎮人。十八歲赴菲律賓，任馬尼拉《平民日報》記者，二十三歲出任華僑學校校長。後返里任安海縣佐(區長)。1926年到新加坡，任南洋影業公司《電影週刊》主編。戰後創立光華影片公司、南華影業公司。曾任新加坡晉江會館主席八年。⁵⁵

李鐵民，福建永春人。1915年隨父到新加坡。他曾任《叻報》總編輯、《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編輯，並與李西浪合辦小報《消閒鐘》。如前文所述，他又曾擔任陳嘉庚的私人秘書，協助籌募抗日捐款。新加坡淪陷前夕到印尼蘇門答臘島石叻班讓(Selat Panjang)避難。1944年秋在巫乳被日軍遞捕。戰後他參與了中國民主同盟馬來亞支部，任常委兼組織部主任。1949年後，回北京任中僑委副主任，並當選為全國僑聯副主席。1956年卒於北京。⁵⁶

謝雲聲(?–1967)，原名龍文，福建南安人。1937年赴新加坡，在南洋女子中學、振東學校等校任教師、校長。抗戰時期轉業從商。戰後重執教鞭，任裕華學校、培基學校校長。後執教女子職業中學，直至退休。曾任新聲詩社社長，著有《海外集》(附哀思錄)等書，又與李冰人合編《郁達夫紀念集》。⁵⁷

從以上資料可見，《蘭花集》的作者都有不同的南來經歷。他們大多曾在報界服務，且在報章上力倡抗日。除李西浪是廣東人外，他們都是福建人。職業和同鄉關係顯然是他們能互相認識的主要原因。再者，如鄭光漢《蘭花集》序中所述，當時他們有不少人寓居於中峇魯(Tiong Bahru)一帶，⁵⁸住所鄰近亦方便舉行雅集。

鐵蹄下的生存情境、態度與策略

《劫灰集》與《蘭花集》深刻地反映了一群新加坡文人在日據時期危苦淒絕的生活現狀，渴慕自由的心情，以及耿介孤高的人格和強烈的國族意識。傅无悶為《劫灰集》所寫的序文即如是說：「時則豺狼當道，殘賊株連，人命賤於雞豚，狐鼠塞於城社。民眾在淫威之下，疾病呻吟，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雖遭危處變，境各不同，而中懷鬱結，呼籲無門，渴慕自由，如旱望雨，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⁵⁹李西浪寫於1942年的〈星洲淪陷後追憶七律二十二首〉，追述了新加坡淪陷的經過、市面慌亂的情形和市民生計的困頓，堪稱「詩史」。其中第十八首著重描寫除夕時(即淪陷前夕)哀鴻遍地的景象：「千家野哭可憐宵，沉魄浮魂不可招。黑漆一樓人守歲，紅光滿樹

⁵⁵ 同上注，頁54。

⁵⁶ 同上注，頁48；「百度百科·李鐵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92540/11113499.htm>(2016年1月27日)。

⁵⁷ 柯木林：《新華歷史人物列傳》，頁193。

⁵⁸ 鄭光漢：《蘭花集》，頁1。

⁵⁹ 李西浪：《劫灰集》，頁五上。

鳥離巢。傷心有淚重沾臆，裹腹無糧更束腰。忍看明朝增馬齒，更堪彈雨尚瀟瀟。⁶⁰ 所謂「裹腹無糧更束腰」，饑餓，成為了淪陷前後新加坡人民經常要面對的問題。李西浪在〈客至〉一首中即描寫了糧食缺乏的窘況：「廚中米告罄，何以慰來客。釜底已抽薪，誰能求一石。儼然子在陳，浩歌度永夕。世界等洪荒，空悲鳥獸跡。」⁶¹ 在這種嚴峻的生存環境，詩人仍以孔子在陳的故事自勉（若按袁一丹的「隱微修辭」說法，則是對典故的挪用），借「浩歌」來砥礪氣節。然而「洪荒世界」之中，並非人人都能做到像李西浪那樣不屈不撓。

日軍進駐新加坡後，一方面採用暴力統治，鎮壓民眾，一方面又籠絡、誘逼士商為其效命。在日軍凌辱之下無奈屈節者自不在少數，而為謀取私利，自願媚敵者亦比比皆是。李西浪〈次韻浪漫壬午歲暮書懷〉二首其一云：「浮雲身世不甘貧，出岫無心亦有因。屈節盡非文信國，餓殍多是葛天民。迎春早覺風光異，入夢頻驚秩序新。玉砌朱欄無限感，海山懵懵作癡人。」其二云：「可憐新貴多如鯽，爭道溫柔住有鄉。未必背無芒刺在，也應日覺死生忙。金夫只許談黃白，名姓何關說臭香。太息薰蕕誰足辨，寡廉鮮恥已平常。」⁶² 「新貴」屈節投敵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大抵都是「不甘於貧」。有些雖則心懷愧疚（「未必背無芒刺在」），但為生計所迫（「也應日覺死生忙」），亦無可如何。有些則只是為了追逐一己的利益（「金夫只許談黃白」），以至遺下臭名亦在所不惜（「名姓何關說臭香」）。作者歎息在此滔滔亂世，要分辨黑白是非不容易，而「寡廉鮮恥」已是司空見慣之事。

在〈詠史〉一什中，李西浪又借賽金花（傅彩雲）、蘇秦的故事，批判一干「從賊」及貪圖富貴者：

傷心醜虜縱橫日，轉憶聯軍蹂躪時。太息眼前從賊輩，為何不及一蛾眉。

（賽金花）

錐股深宵願未違，連橫六國竟榮歸。只圖富貴驕鄰里，一卷陰符讀已非。

（蘇秦）⁶³

八國聯軍入京時，賽金花曾勸說聯軍統帥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 1832–1904）切勿濫殺無辜，由此頗得時人好評。而蘇秦為六國獻上連橫之策，除了是為報復秦國不採納其合縱的計謀外，還欲以富貴誇耀於鄉人。他是那種毫無道義的功利主義者。因此賽金花與蘇秦雖然同樣「投敵」，但目的卻各自不同，而李西浪對他們的褒貶亦清楚地反映在兩首詩中。再如寫於1944年的〈哀汪精衛〉四首、〈意有未盡

⁶⁰ 同上注，頁八下。

⁶¹ 同上注，頁十上。

⁶² 同上注，頁九下至十上。

⁶³ 同上注，頁二八上。

再賦七律二首〉及〈又五律二首〉，嘲諷剛在名古屋病亡的汪精衛與日人合作是「與虎謀皮」，結果只會引來後人的唾罵：「少能作俠頭羞在，老喜依人鋏屢彈。不與朱胡爭大節，行同檜莽唾為奸。」⁶⁴ 汪氏少年時參加革命活動，寫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樣慷慨激昂的名句，不料晚年竟忍心從賊。相較於同時的朱（執信，1885–1920）、胡（漢民，1879–1936），不免大節有虧。

李西浪嫉惡如仇，李鐵民的《劫灰集》序亦有提及：「新加坡陷敵後，君介然自守。雖黑霧漫天，怪狀眩目，昔日貧兒，今成暴富，君不屑一眄。日惟與二三知己，縱酒高吟，以自排遣。朋輩中有不耐日啖薇蕨者，君則諷之以詩。其於出處大節，有若寒松晚翠，瘦菊霜華。」⁶⁵ 這種在逆境中不改素志的表現，恰如安史之亂時的杜甫。李西浪在詩中確亦頗以杜甫自擬：

〈壬午中秋〉：「問余劫後情何似，恰似當年杜老情。」

〈贈王道明〉二首之二：「白雲蒼狗嗟何世，沉鬱聊吟老杜詩。」

〈龍孫五十初度詩以壽之即用其自壽原韻〉：「青山坐捫蝨，但擬杜少陵。」⁶⁶

李氏集中復有不少化用杜詩的句子。以杜甫的人格、作品為對照，不僅可看成是作者對個人出處與價值觀的自我評定，更可視為他對中華文化的回溯與致敬。像杜甫始終對唐室不離不棄那樣，李西浪亦堅信重光有日，並常與友人以氣節相砥礪：

李西浪〈贈林曉鐘〉：「留得頭顱無恙在，他時重把慶功杯。」

李西浪〈思漢齋四度賞蘭光漢喜宴鐵民拈得者字〉：「忍辱以求存，且學信出袴。光明能再見，預祝杯同把。」

李西浪〈龍孫五十初度詩以壽之即用其自壽原韻〉：「栖栖亂世中，獨抱冰霜節。」

鄭光漢〈重陽後三日，盆蘭四度開花……〉：「君子不改節，我欲拭目觀。」⁶⁷

在與友朋互相酬贈的過程中，詩人們對光復的信念得以進一步鞏固。彼此的志操，亦獲得了肯定和策勵。詩歌由此成為了他們表彰節義、凝聚群體的有力工具。在《蘭花集》的群體唱酬中，類似的笙鳴鏞應的寫作現象，更透過傳統的寄托手法得到充分的彰顯，這點且留待下一節詳談。

⁶⁴ 〈意有未盡再賦七律二首〉之一，載李西浪：《劫灰集》，頁二一上。

⁶⁵ 李西浪：《劫灰集》，頁二上至二下。

⁶⁶ 同上注，頁九上至九下、十一下、十七上；鄭光漢：《蘭花集》，頁15。

⁶⁷ 李西浪：《劫灰集》，頁十二上、十九下、十六下；鄭光漢：《蘭花集》，頁15。

受到日軍的嚴密監控，含光隱晦，待時而起，成為了當時耿介自持的文人普遍的處世之道。正如《論語·泰伯》所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他們被困於「危邦」、「亂邦」之中，生命時刻受到威脅，又不願顛頽事敵，便只能採取低調、消極不合作的生存策略。在前述的〈次韻浪漫壬午歲暮書懷〉第一首末尾，李西浪便道：「玉砌朱欄無限感，海山懵懵作癡人。」在感念家國的同時，他亦要裝癡作呆，來面對當時恐怖惡劣的環境。或者如李西浪筆下的鄭光漢那樣：「世亂偏埋首，時危只染翰。」⁶⁸埋首於吟詠與書畫之中，寄託自身的情懷，這不特是鄭光漢一人的志趣，亦是《蘭花集》諸君共同的寫照。

除了吟詩作畫，借酒澆愁亦是《蘭花集》同人在危城中常見的生活行為。正如李西浪自嘲云：「笑予近解癡聾意，日把清樽學醉翁。」⁶⁹因為酒可以暫時使人忘卻精神上的創傷，可以宣洩平日的鬱悶，讓飽受日人閹割的靈魂重現雄風，更可以刺激詩人的創作慾。職是之故，在《劫灰集》和《蘭花集》中，有關飲酒的詩作層出不窮。詩人甚至以鬥酒為樂，似乎在酒國之中與對手一決雌雄，便如現實中與敵周旋一樣。飲酒這一行為遂被賦予一定的象徵意義。以下的詩句可見一斑：

傅无悶〈蘭宴〉：「主人此日麌酒兵，旁挑側擊氣縱橫。……李侯病醒甘退卻，胡生興發不示弱。我本酒國退伍兵，隨緣附驥共一搏。」

李西浪〈次韻傅老〉：「大敵當前誰敢卻，壁壘森嚴肯示弱。」

胡浪漫〈光漢蘭宴酒後賦此〉：「況復今宵有主盟，酒陣能張十萬兵。進退裕如意大將，春風十里亞夫營。……此時不飲亦不得，萬馬奔馳如逐北。誰非酒氣壯山河，有似勇夫歌出塞。」⁷⁰

李西浪〈次韻光漢酒後見贈〉：「不甘談敗北，稱霸競為東。」⁷¹

詩人的雄心壯志，在酒國中得以盡情發抒。他們不再是忍氣吞聲的奴隸，而彷彿化身為勇猛無匹、氣吞山河的戰將。李鐵民唱和李西浪的一首詩，更把宴會上的各種情形想像成戰場一樣：「浪公雅似東山謝，斂智沉機觀變化。興來置酒召詩朋，席間俄頃風雲咤。傳饌捷於出甲兵，猜拳巧若觀馳射。吾欣嚼肉免過屠，人正用兵不厭詐。波雲詭譎海天翻，風鶴號鳴草木訝。竊疑乾坤賭擲中，未改綸巾談笑暇。」⁷²類

⁶⁸ 李西浪：〈贈光漢〉，載《劫灰集》，頁十上。

⁶⁹ 李西浪：〈壬午歲暮〉，載《劫灰集》，頁九下。

⁷⁰ 以上俱見鄭光漢：《蘭花集》，頁9–11。

⁷¹ 李西浪：《劫灰集》，頁十二下。

⁷² 李鐵民：〈荒島歸來，西浪置酒相慶，諸友分韻賦詩以紀佳會，拈得夜字〉，載李西浪：《劫灰集》，頁十八下。

似把鬥酒視為鏖兵的作品，在李西浪的《劫灰集》中更是連篇累牘。袁一丹在探討北平淪陷時期文人的表達策略時指出，這些文人在挪用遺民傳統的典故、文體話語資源的同時，亦承繼了一整套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模式，譬如乞食、逃禪、蓄鬚、焚書、毀棄衣冠等。⁷³ 酗酒、縱酒大抵亦是其中一種消極的不合作行為。甚或我們可以解釋為：這些詩人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披甲上陣，故而只能透過鬥酒來抒發其殺敵報國的願望，或展示其不屈不撓的精神。而「酒國」或「酒陣」中除了著重膽識，亦講求謀略（「兵不厭詐」），形勢千變萬化（「波雲詭譎海天翻」），而飲者在對手步步進逼的情況下，仍談笑自若，胸有成竹，就像當年輕描淡寫擊退強敵的謝安和諸葛亮一般（「浪公雅似東山謝，……未改綸巾談笑暇」）。這一情境，讓人想起李白在安史之亂爆發後，避亂於東吳時所寫的〈扶風豪士歌〉，雖然有關飲宴，卻未忘掉平定天下的素志。⁷⁴ 李西浪即曾明言：「縱酒豈真耽樂逸，耿介尤為俗所嗤。」⁷⁵ 因此，我們若把這些詩人縱酒的行為等同於一般的尋歡作樂，不但有失公允，而且會忽略了作品背後蘊含的、複雜而微妙的語境和寫作動機。

鬼域中的淨土：遺民意識與話語的再現

日據時期的新加坡，民不聊生，恐怖穢濁，彷如一「人間地獄」或「鬼域」。李西浪的作品中即不時出現「地獄」、「劫」及「鬼」字，例如：

〈曉鐘染恙詩以慰之〉：「可憐地獄中，藥物苦獨少。」

〈一夕〉：「遭此曠代劫，苟活邀天幸。」

〈雨後書感〉：「纍纍新塚鬼含冤，滿眼淒涼隔故園。」

〈王齋小集以春城無處不飛花為韻拈得處字〉：「縱橫鬼畜行無路，舞爪張牙情可怖。」

〈和逸史感舊原韻〉：「新詩感舊秋蕭瑟，放眼縱橫鬼畜贏。」⁷⁶

「鬼畜」一詞借自日語，源於佛教，是六道中的餓鬼與畜生兩道的合稱，後用以指兇殘無道者，亦指慘絕人寰的虐殺行為。此詞在李西浪集中凡數見，用來指稱殘暴的日軍，極為恰當。

⁷³ 袁一丹：〈隱微修辭：北平淪陷時期文人學者的表達策略〉，頁7。

⁷⁴ 見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94。

⁷⁵ 李西浪：〈冬至後三日寓樓小酌，醉後忽與鐵民作舌劍之爭，因步其冬至日鄭齋飲後一字韻以贈〉，載《劫灰集》，頁二五下。

⁷⁶ 李西浪：《劫灰集》，頁十三下、十二上、二九下、十九下、二十下。

鄭光漢曾繪有一幅《冷月詩魂圖》，從畫題可以想像，圖中的詩人置身於一片陰森冷寂的環境。這自然是日據時期新加坡文人心境的寫照。李西浪所寫的題畫詩，亦是鬼氣森森，由此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此圖背後的含義：「此詩有鬼氣，此畫疑鬼斧。殘碑與冷月，詩魂獨栩栩。讀此詩中畫，儼如臥風雨。可憐鬼世界，良工心實苦。」⁷⁷在令人生畏的「鬼世界」上，詩人與畫家分別創作出具有「鬼氣」的詩句，和「鬼斧」神工般卓絕的畫作。他們與友人亦透過鄭光漢的思漢齋唱和，在現實與精神層面努力營造一方淨土，以固守、滋養自己的人格與氣節。從活動的含意、呈現的方式，以至於言語的闡述方面，思漢齋唱和都顯示出與前代遺民接軌的地方。遺民意識對他們而言，已不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想像，而是具有切身的體驗。

鄭光漢寓所蘭花盛開，為他和文友帶來了舉行雅集唱和的契機。他們很自然聯想到南宋遺民鄭思肖的故事，並以其人格言行為楷模。鄭思肖之名乃在宋亡後所改，暗寓趙宋已亡（「趙」字由「走」、「肖」二字組成）。他又自號所南，意謂始終心向宋帝奔亡的南方。鄭思肖所畫蘭花都不見土根，人或問之，則答曰：「地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邪？」以此比喻國土淪亡。⁷⁸眾所周知，蘭花每生長於幽谷之中，清香雅淡，不與群芳競秀，故歷來被中國文人視為品格高潔的象徵。與鄭思肖一樣，鄭光漢等亦同樣沉淪於異族的統治，而且是屬於域外的沉淪，自比為托根非地的蘭花，實在恰當不過。鄭光漢將寓所命名為「思漢齋」，用意亦如鄭思肖在宋亡後改易名號一樣，有不忘故國之意。他與友儕所畫的那些不著泥土的《墨蘭》圖（見下圖），筆意同樣師承自鄭思肖。至於他們的雅集，則與宋代遺民組成的月泉吟社、汐社的唱和一般，帶有濃厚的政治寄托意味。⁷⁹潘受為《蘭花集》所寫的題詩，其中一首即將鄭光漢等的唱酬比為汐社：「楚囚對泣作危談，汐社題襟酒半酣。卻憶相尋塵滿眼，每將城北認城南。」⁸⁰

在思漢齋這方「鬼域」中的淨土舉行雅集，前後共有七次，首倡於癸未年（1943）十月，迄於乙酉年（1945）六月。第二至第六次雅集時間分別是在癸未年十一月、甲申年（1944）三月、甲申年九月、甲申年十一月、乙酉年五月，每次都是藉蘭花開放而舉行。活動不外賞花、飲宴、吟詩三種（最後一次還順祝鄭光漢弟獲麟之喜，並設湯餅之宴以賀）。雅集唱酬原是中國傳統文人經常參與的文娛交際活動，即使在淪陷期間受到日人嚴密監視，鄭光漢等仍冒死舉行雅集，顯然別具深遠的文化傳承與抗爭的意義。鄭氏為《蘭花集》自撰的序文，即記述了雅集同人的志趣、蘭花開放給他們帶來的驚喜，以及賞蘭背後的目的：

⁷⁷ 〈冷月詩魂畫〉，載李西浪：《劫灰集》，頁十下。

⁷⁸ 明程敏政引盧熊：《蘇州府志》，載程敏政（輯）：《宋遺民錄》，《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頁628。

⁷⁹ 參考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46–57。

⁸⁰ 鄭光漢：《蘭花集》，序頁8。

時好友寓居於中峇魯區者不少，同具憤世疾俗之心，恥與金夫鼠輩為伍，蟄居斗室，度日如年。而花竟似知人意者，當茲百無聊奈之際，忽而含苞，繼而蓓蕾，終而開花矣！夫一花一木，蕞爾小事耳。……第人於心情惡劣，極度苦悶之時，忽見一莖挺秀，幽香冉冉，則素之目為蕞爾小事者，今亦視為稀奇可貴矣！……每次花開必置酒邀朋，共謀一醉；而諸友亦抱不醉無歸之旨，相與作長鯨飲，徹夜談。夫何為而醉？為花醉耶？為酒醉耶？抑或為人為時醉耶？……而每次大醉之餘，則又藉草木以興懷，抒胸臆於吟咏。⁸¹



鄭光漢、劉海粟所畫《墨蘭》

蘭花適時開放，對「百無聊奈」的文友起了激勵作用。他們從蘭花的開放意會到，處境即便如何險惡，只要秉持頑強的意志，則定能生存。雅集成為一個政治立場相同、志趣相近的文人群體，讓他們能相濡以沫。李西浪寫於1945年的序文亦交代了唱酬的情形，而且將雅集的寓意說得更清楚：「昔鄭思肖畫蘭不見有土，人怪而問之，則曰，宋土已亡，根從何着，寄意之深，實不勝其痛矣。以古證今，恍惚遇之，雖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彼一蘭也，此一蘭也，其根必有着土之日也，長夜漫漫，曉雞已唱，吾儕其拭目以俟之乎！吾儕其與王者之香並茂乎！」⁸²序文直接

⁸¹ 同上注，頁1。

⁸² 同上注，頁4。

將他們的遭際與鄭思肖相提並論。末句的「王者之香」指蘭花。據蔡邕〈琴操·猗蘭操〉：「〔孔子〕自衛返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⁸³ 鄭光漢他們的確生不逢時，但從「其根必有着土之日，……吾儕並王者之香並茂乎」等句，可見出他們對光復抱有非常樂觀的態度。這種語調是前代遺民作品中少見的，皆因其時中國軍民尚在奮勇抗戰，而隨著戰局的發展，日本的敗亡已是指日可待矣。

《蘭花集》既然是一部借詠蘭來寄寓家國之思的唱酬集，又受到前代遺民的影響，則傳統的比興手法與遺民語典、事典，自然屢被挪用於眾人的作品中。袁一丹指遺民傳統是隱微書寫取用不竭的資料庫，並稱使用者可以借這類加密的信息防範未經授權的讀者（簡單而言即「敵對者」）浸入。⁸⁴ 筆者則認為，《劫灰集》、《蘭花集》的隱微書寫，其所謂的「加密程度」與北平淪陷時期周作人等的作品，仍有一定的差別。李西浪等或因為內心已有明確的亂世價值觀（即敵我分明的觀念），故寫作時無需躲躲閃閃，文辭較為易曉，熟諳中國文學傳統的讀者，都不難看出其中的用意。周作人等「落水」文人則既要向讀者（包括同時及未來的）作辨解，又要作自我的心理調適，故行文每多吞吐，顯得較為隱晦。以下摘自《蘭花集》的作品，可明顯見出鄭光漢等對遺民話語的重構，首先是鄭思肖畫蘭的典故：

鄭文通〈光漢家飲酒看蘭酒後賦此〉：「系出所南同祖德，託根無地復何傷。」

沈逸史〈師漢齋四度觀蘭，分得為字〉：「酒酣握管寫蘭影，痛無故土培榮滋。當年所翁有此本，哀哉千載仍相思。師漢齋頭再賞蘭，此意悄悄深喻之。」

李鐵民〈幽蘭吟為鄭大五度慶蘭宴作〉：「筆底傷心不見土，鬚眉戟立所南翁。」

鄭光漢〈詠蘭五絕句，紀念五度開花〉其五：「幾人寫得蘭花妙，思肖傳神筆最工。卻嘆託根無淨土，千年遺慨抵今同。」⁸⁵

沈逸史一首，尤其顯著地將鄭思肖與他們的賞蘭活動相提並論。其次是在詩中讚美蘭花的特性，並語帶相關地提到詩人的志節，感嘆時局動盪：

李西浪〈光漢盆蘭花開第一次，特邀浪漫，文通等飲酒看花……〉：「傷心鬼畜正橫行，一箭盈盈姿獨媚。」

沈逸史〈幽蘭吟承麻韻餘意而作，再贈光漢道兄先生斧存〉：「空谷有幽蘭，榮悴非所期。芬芳寧自賞，窈窕恥干時。鄭君移古盆，抱甕勤扶持。不讓蟲蟻

⁸³ 蔡邕：《琴操》，《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一年（1806）刻《平津館叢書》本影印，頁147。

⁸⁴ 袁一丹：〈隱微修辭：北平淪陷時期文人學者的表達策略〉，頁12。

⁸⁵ 鄭光漢：《蘭花集》，頁7、15、20、21。

侵，不令蕭艾欺。」

鄭光漢〈重陽後三日，盆蘭四度開花……〉：「劍葉翠欲滴，紅芽羞染丹。素姿霜雪比，幽香送不殫。……對斯王者瑞，彌憶仲尼言。君子不改節，我欲拭目看。」

蘇秋生〈師漢齋四度觀蘭，拈得王字，用賦一律，以呈主人〉：「南蠻移植閑情少，空谷幽棲野趣長。無限悲思關不住，一枝吐露弔滄桑。」

李西浪〈師漢齋五度賞蘭〉：「此花骨格豈尋常，遍地烽烟磨不死。挺然獨秀一盆中，萬劫紅蓮差可比。」

鄭光漢〈詠蘭五絕句，紀念五度開花〉其四：「素質好將霜雪比，孤芳未惹蝶蜂忙。」⁸⁶

表面上吟詠蘭花氣韻高潔，且能抵禦霜雪，實質上是詩人對自我人格的期許。李西浪的兩句：「此花骨格豈尋常，遍地烽煙磨不死。」既寫花又寫人，反映了詩人在異族統治下不屈的精神。另外，鄭光漢〈端陽過後，盆蘭六度開花，喜極賦此〉亦有句云：「夫物亦猶人，生機天所付。」將花比喻為人的用意亦昭然若揭。我們將《蘭花集》與古代遺民的作品兩相對照，很容易看出其中的關係。例如鄭思肖的〈墨蘭〉云：「抱香懷古意，戀國憶前身。……淒涼如怨望，今日有遺民。」以蘭與遺民相比。又如其〈寒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⁸⁷雖然是詠菊，但其秉性堅剛的特質，卻與蘭花一脈相通。當然，這亦是鄭思肖的自我比喻，意謂寧死不願事敵。

除了以上具有比興意味的作品外，《蘭花集》的詩人有時亦採用直抒胸臆的筆法，對紛擾、渾濁的時世表達了看法：

鄭光漢〈次傅老韻〉：「況今身處干戈裏，人慾橫流渾茫茫。」

李鐵民〈長歌贈光漢，即用蘭宴分得香字韻〉：「一自長鯨翻浪破霓裳，人間何物不滄桑。百萬蟲沙淒歸鶴，千山城郭九蒿邱。願借酒百杯，拚灑淚千行。化作天河水湯湯，為此世界一洗五濁腸。」⁸⁸

「干戈」、「長鯨」自然直指戰爭，而其所帶來的災禍，則不但是人命的傷亡、地方的破敗，而且令人性極度扭曲。在惡濁的生活夾縫中，在被剝奪了社會的話語權之後，詩人仍歇力維持自我幽潔的世界，堅守一己的出處大節，在有限的個人領域持續發聲。這在當時而言，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⁸⁶ 同上注，頁8、14、15、16、19、21。

⁸⁷ 鄭思肖(著)、陳福康(校點)：《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7、290。

⁸⁸ 鄭光漢：《蘭花集》，頁11、17–18。

敘事 / 抒情與個人表述 / 群體唱和

謝松山描寫新加坡日據時代的《血海》，採用了紀事詩的寫作手法，詩歌與注文相輔相成。詩是對史事或見聞概括、精警的勾勒，當中夾雜了作者的主觀情感與想像，而注文則是對詩作內容的詳盡補充和解釋，與報章的報導、史料可以互為參照。要之，敘事乃其主要的書寫模式。⁸⁹《劫灰集》與《蘭花集》則展示了另外兩種不同的寫作特質：《劫灰集》是個人經歷與心境的表述，《蘭花集》則屬群體唱和。它們雖然以抒情為主，卻亦帶有一定的敘事元素。

《劫灰集》中的〈星洲淪陷後追憶七律二十二首〉，敘事成份頗為濃厚，與《血海》中描述新加坡失守過程的篇章稍為相近。然而除了詩歌形式不同外（《血海》採用的是七絕），李西浪亦不像謝松山那樣，在每首詩後附上注文，最多只有非常簡短的按語。因此讀者需透過詩作本身來了解內容，或者搜尋史料，來「以史證詩」。例如第十一首：「惡訊傳來鬼亦號，驚心動魄炸長橋。被圍四野民先亂，困守孤城士欲逃。雲黯漳宜風瑟瑟，氣騰海峽浪滔滔。一聲令下情尤急，滿市紛紛掘戰壕。」⁹⁰「炸長橋」指英軍從馬來亞撤退到新加坡後，為阻遏日軍南進，將柔佛長堤炸毀一事。⁹¹「漳宜」一句亦可找到史料參證。據說英軍在新加坡的防禦計劃，完全偏重在漳宜角以迄丹絨禹（Tanjong Rhu）一帶。日軍亦的確在進攻前幾日集中炮擊新加坡東北部，包括漳宜。然而這只是日軍聲東擊西的詭計，他們最終是從西北部大舉登陸。⁹²李西浪這類詩固然有參照史實的一面，但亦頗多個人的感慨，又採用虛筆描寫，例如「氣騰海峽浪滔滔」一句，即透過寫景來比喻形勢的險峻。又如第十六首：「五層樓上月朦朧，奇景都歸一覽中。照海明燈橫匹練，震天白砲響村春。車行五夜驚蛇伏，箭發長空信鵠同。立久愴然心欲悸，颼颼撲面有腥風。」⁹³寫的是危城中惶恐不安的景象，以個人筆觸書寫出所有被圍困者憂懼的心情。這樣的作品固無特定的史料可徵（首句的「五層樓」亦沒有明確的指稱），然而卻貼近當時的形勢，起到「以詩證史」的作用。這些有關新加坡淪陷的詩作，無疑帶有一定的地方色彩，但作者顯然不是為了刻意突出地方色彩或地方意識而寫，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情態、場境下，一種自然生就的書寫趨向。

《劫灰集》其餘的作品，多屬李西浪在淪陷時期的個人抒懷及與友人的贈答，敘事成份較少，筆者在前面有關生存態度與策略一節已略有介紹。其中〈無題〉八首是

⁸⁹ 見謝松山：《血海》（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1950年10月第3版）。

⁹⁰ 李西浪：《劫灰集》，頁七下。

⁹¹ 參閱許雲樵（原主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頁196。

⁹² 同上注，頁237、197。另見Turnbull, *History of Singapore*, p. 183。

⁹³ 李西浪：《劫灰集》，頁八上。

悼亡之作，記載了一段亂世情緣，這是李西浪私生活的剪影，但亦不無時代氣息。茲摘錄四首如下：

卅年孽債一朝還，消息傳來涕已濶。嗟我半生吟鬢苦，憐卿到死舞腰蠻。
恨無楚些招魂句，恐有湘筠滴淚斑。欲覓小青埋骨地，可憐荊棘滿丘山。
(其一)

猶記風流廿載前，識卿恰是破瓜年。歌喉的是鶯聲脆，粉臉真同杏子圓。
席上驚逢唯有笑，座中羞避竟茫然。香閨乍入偏成愛，冤孽懸知締夙緣。
(其二)

事如潑墨豈無痕，一載同居不羨仙。癡愛笑予揮白鑑，憐才痛你到紅船。
為除孽海千重障，斬斷情絲萬縷纏。夜半披衣衝戶去，滿頭星月奈何天。
(其五)

悲歡離合話連篇，綺思傷懷撩客邊。幻滅卿今已無垢，色空我早悟逃禪。
子安艷筆應瞠目，如是清才敢比肩。太息前塵正如夢，更堪遍地又烽烟。
(其八)⁹⁴

寫作的對像應是一位剛去世的歡場女子。據內容推測，李西浪與她交往已有二、三十年（「卅年孽債一朝還」），其間兩人曾同居，後來又因故分開（「斬斷情絲萬縷纏」）。李西浪在第七首有小注指出，這位情人「曾到上海入影界，未匝月即去」。這組詩從標題到寫法，都頗有點李商隱的影子（前引沈逸史稱李西浪「間或略擬義山」），內容亦真實地反映出新加坡文人在淪陷時期生活的另一面。他們不盡是鎮日懷憂苦毒，或只會關心國事，渴求光復，而是依舊繫心於男女情慾，保持著傳統文人的風流個性。這是人性的發抒，像需要柴米油鹽一樣來得自然。難得的是，在這段風流韻事的背後，我們彷彿仍聽到戰爭的殺伐之音：「欲覓小青埋骨地，可憐荊棘滿丘山」、「太息前塵正如夢，更堪遍地又烽烟」。一段私情，在紛擾的時局、淪陷的異域中戛然而止，對作者（甚至讀者）而言，更顯得淒豔動人。

〈無題〉詩雖然是李西浪個人情事的表述，卻牽動了文友的感觸，由此引發了一次唱和。沈逸史寫了一首〈書無題詩後〉，而李鐵民則有〈讀無題詩後感和〉八首。他們一方面同情李西浪的遭遇，一方面亦有感於戰爭對日常生活帶來的破壞。以下是李鐵民的兩首和作：「慘淡乾坤萬物枯，落花滿地眼模糊。問君吟罷傷心句，續得狂歡時節無。」(其一)「舊調淒涼忍再謳，廿年心影入江流。夜寒燈冷牛車水，莫問繁

⁹⁴ 同上注，頁二三上至二四上。第一首第二句末字作「潛」，不協韻，疑為「濶」字之誤。

⁹⁵ 同上注，頁二四上至二四下、二五上。

華天寶樓。」(其七)⁹⁵第一首提到的《狂歡時節》，據詩內小注，是一部李西浪記述友朋遊樂的作品。可知李西浪等人確曾過著頗為風流不羈的生活，而這一切隨著新加坡的淪陷而煙消雲散。兩首詩在感嘆舊歡如夢的同時，亦以世亂為背景。第二首句末的天寶樓，可能是酒家的名稱，整句顯然亦借唐代的安史之亂，來喻指新加坡的淪陷。要之，在戰爭期間，個人往往不能置身事外，即使是私生活亦會受到牽連。而個人的經歷與憂戚，亦總是與大眾的命運息息相關。是以李西浪的〈無題〉詩，雖然是陳述一己的私情，但詩中觸及到的亂離情景，卻又是其文友所能身同感受的。而且他們對戰前尋歡作樂的生活，都有同樣愉快的回憶。

群體唱和的特質在《蘭花集》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唱和往往都有統一的主題，在此蘭花即是詩人們共同吟詠的對象。此外，採用相同的詩歌體裁和韻部，亦是唱和常見的現象，但《蘭花集》的七次唱和，卻不一定都採用一致的詩歌體裁，或古體，或近體，或詞，有時次韻，有時分韻，形式幾乎每次都不同。比較一致的是第三次和第七次：第三次以李西浪的七律為首倡，多數詩人據此唱和原韻；第七次則以沈逸史的七古為首倡，除了李鐵民填詞外，其餘四位詩人都依據沈氏原韻唱和。以下對第七次唱和略作分析。

第七次唱和的主題除了詠蘭外，還祝賀鄭光耀（鄭光漢弟）獲麟之喜，蘭花再次開放遂被用來比擬嬰兒誕生。新生命的出現，在當時被異族統治的情勢下，顯然是極為值得慶賀的事：除了是為一個家庭增添成員外，還代表華人的血脈始終綿延不絕，不會被鏟除淨盡。五首唱和的作品中，最值得品味的幾句是：

李西浪：「座中誰不為花歡，世界今成倒啖蔗。」

鄭光漢：「何況時際戎馬秋，得之寧論連城價。……卻嘆家山路萬重，傳書焉得片羽假。兩地幾年苦相思，興念及此情不乍。」⁹⁶

其時日軍在戰場上連連失利，光復近在眼前，故李西浪以「倒啖蔗」為喻，意謂即將苦盡甘來（原詩見下圖）。「座中誰不為花歡」一句，則指花開與獲麟不僅是主人家的喜事，友人都由此看到生命的轉機。鄭光漢更指出在淪陷期間，有此喜事是相當難得的。他又提到因戰亂而與故鄉的親友音訊隔斷，表達了海外華人對故國的眷念之情，其中的國族意識不言而喻。由此可見，這些唱和不只是文人間酒餘飯後的文字遊戲，還具有非常獨特的時代意義。

⁹⁶ 同上，頁二五、二六。

思漢齊七度賞蘭沈老作長句紀盛索和即用其
韵

西浪

前週痛飲祝花開餘興至今猶未罷花結主人不解緣
又吐奇葩一箭並姍々姿態如美人陣々幽香豈輸麝
花開七度宴七度如然嫣紅与紫妃畫家詩伯到連翩
倒履欣然主人迓恰逢英物試啼聲兆喜早知何足訝
調美妙手出洪爐湯桌珍饈不問價千金美酒飲如鯨
酒氣冲天斗牛射座中誰不為花歡世界今成倒啖蕉
嗤我酒酣聲更洪醉後狂言馬豈駕今朝酒醒又吟詩
祝花長韵歸愚籍淨几明窓羲浩歌生花筆欹江淹假
縱不詞源峽倒流也放詩思潮來乍詩成一字易長公
餘情似酒那堪澆（東坡詩餘年似酒那堪澆）

李西浪在《蘭花集》第七次唱和中的作品

結 語

《劫灰集》與《蘭花集》兩部在新加坡日據時期寫成的舊體詩集，創作模式雖然不同，但都為我們揭示了淪陷期間新加坡文人的生存情境、態度與策略。他們在日本統治者的監視下，以詩言志，表現出堅韌的生存意志，以及對光復的渴望，同時借酒澆愁，抒發備受壓抑的豪情壯志。他們復以南宋遺民鄭思肖為榜樣，透過詠蘭畫蘭，凸顯自身高潔不群的品格，展現濃厚的家國意識。而群體唱和，則讓他們在極為惡劣的環境，能與志同道合的文友一起，維護一方精神領域的淨土，彼此砥礪氣節。

抗戰時期，舊體詩創作在中國出現了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一個高峰，不少從事白話文創作者，都重新採用舊體詩形式，書寫家國情懷，痛陳戰亂所帶來的禍害。此無他，舊體詩是中國的國粹，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和深厚的傳統，以此來表現作者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身份，最為恰當。然而，在淪陷區創作的、表達反抗意識的舊體詩卻難得一見，此實由於創作環境險惡所使然。以此觀之，《劫灰集》與《蘭花集》二書傳世，便更顯得難能可貴，而且它們是由一群離散文人於遠在海外的新加坡寫成的。

李西浪、鄭光漢等人的國族意識，亦透過兩部詩集得以彰顯。近年新、馬華文學界喜談「去中國化」，甚至懷疑早年的新、馬文學已是寫在家國之外的產物，國家意識或已不是詩文中要彰顯的對象。但觀乎淪陷前新、馬的抗戰文學，華人社群高漲的抗日救國運動以及《劫灰集》、《蘭花集》中表現出來的家國情懷，則此一想法似乎只是出於一種後來植入的南洋想像。學界或一直只放眼於新、馬的白話文學，以此來定調新、馬華文作者的地身份，而忽略了舊體詩詞創作中無法規避的中華元素。大凡從事舊體詩詞寫作者，幾乎必定要向中華傳統文學和文化汲取養份，透過研讀前代詩人的作品，了解有關的歷史、典故、修辭和創作傳統，然後再談挪用、創新。將舊體詩的歷史和傳統置之不顧，卻能自成一家者，尚未之見。

二戰的烽煙今已熄滅，然而當年慘痛的經歷，仍可透過《劫灰集》、《蘭花集》以及另一部追述新加坡淪陷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得以見之。這三部詩集的問世，無疑對後人起了警醒作用。重溫這些作品，能讓吾人深切意識到，戰爭為生命、財產與心靈帶來的損害是無法彌補的，和平亦並非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以及國際社會的努力維繫。撰寫此文時恰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特以此文向李西浪、鄭光漢等當年飽受磨難的先輩致敬。最後借潘受題《蘭花集》的一首詩作結：

畫筆清如塵尾談，賊中依舊氣沉酣。蘭花無地根何託，愁絕當年鄭所南。⁹⁷

⁹⁷ 同上注，序頁7。

蘭葉情如塵尾談
賦中依舊是兒沈酣
蘭花無地相予託
追當年郵所南

潘受在《蘭花集》的題詩

劫灰與蘭花：新加坡日據時期的兩部舊體詩集

(提要)

林 立

日佔時期，新加坡人民過著水深火熱、慘無人道的生活。這段痛苦的經歷，在不少史籍和回憶錄中都有所記載。筆者近來發現了三套與日據時期有關的舊體詩集。其中謝松山的《血海》，以紀事詩的形式，追述了日軍檢證大屠殺的罪行和淪陷時期暗無天日的社會狀況。《劫灰集》收錄了李西浪寫於日據時期的詩作。較之《血海》，該集敘事的成份減少，而多了個人對於這場浩劫的感懷。鄭光漢、李西浪等所著的《蘭花集》，則是亂世中的文人唱和，它以鄭思肖等南宋遺民為榜樣，透過詠蘭表達了作者的民族氣節和對光復的冀望，以及抑塞無聊、借酒澆愁的情態。本文以《劫灰集》和《蘭花集》為研究對象，首先交代淪陷前新、馬華人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文學創作大勢，次則探討兩部詩集在「淪陷區文學」及抗戰文學中的獨特性，進而從作品剖析日據時期新加坡文人的遭際和心境、遺民意識的重塑，以及敘事與抒情、群體唱和與個人表述之間的關係。回想當年眾人困守危城，境遇之淒苦實有過於八國聯軍入京時的王鵬運、朱祖謀等。而王、朱因目睹時艱，寫就《庚子秋詞》，鄭光漢、李西浪等的酬唱，亦可後先輝映，誠為近百年來海內外華族飽受列強欺凌的文學實錄，具有相當顯著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 新加坡日據時期 舊體詩 《劫灰集》 《蘭花集》 李西浪

鄭光漢

Kalpa Ashes and Orchid Flowers: Two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Collections in Singapore's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bstract)

Lap Lam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ngaporean people lived in utter misery and extremely inhumane conditions. This dreadful experience has been recorded in various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memoirs. The author recently rediscovered thre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collections about the Occupation, including Xie Songshan's *Sea of Blood*, Li Xilang's *Collection of Kalpa Ashes*, and the *Collection of Orchid Flowers* edited by Zheng Guanghan. Xie's poems are produced in the form of a historical record, recalling the Sook Ching Massacre and va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vices during the Syonan years. The *Collection of Kalpa Ashes*, in contrast, expresses in a lyrical way an individual poet's emotional reaction toward this horrible period, while the *Collection of Orchid Flowers* presents correspondence poems written by a group of authors, using the imagery of flowers to represent their anti-Japanese sentiment, their ethnic identity and longing for recove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atter two collections. It first recalls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and pre-occupation Chinese literary writing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second, explicates the uniqueness of the two collections within the so-called *lunxianqu wenzue* (Literature in the Occupied Areas) and wartime literature.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poems,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living experiences and mentality of Singaporean Chinese writers during the Occupation, and how they reconstruct the loyalists' poetry tradition in their writing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and lyricism, individual and group expression. The arduous hardship these writers experienced reminds us of the story of Wang Pengyun and Zhu Zumou during the Allied Forces' occupation of Beijing in 1900. Confined in the capital city, Wang and Zhu produced the *Gengzi qiuci* (Song Lyrics of the Autumn of Gengzi) to express their anger and frustration. The two poetry collections studied here can be seen as an echo to the *Gengzi qiuci*: both are lyrical records of the mistreatment and humiliation that Chinese people suffered in occupied cities, only that the condition in Singapore was much worse. In light of this literary connection, one can further recogniz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i Xilang and Zheng Guanghan's poetry collections.

Key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Collection of Kalpa Ashes* *Collection of Orchid Flowers* Li Xilang Zheng Guanghan